

雷曼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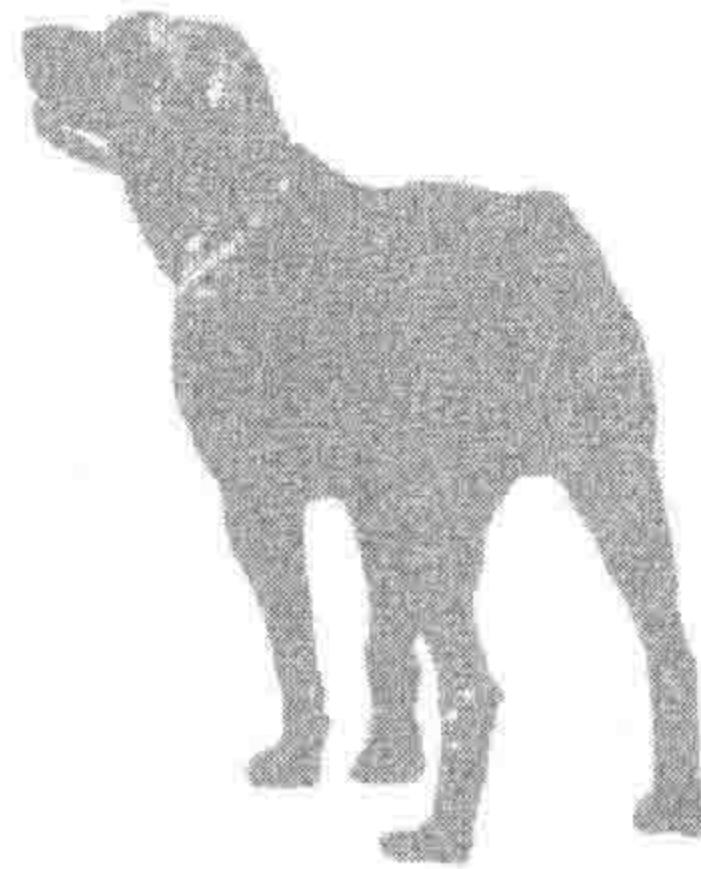
〔德〕斯文·雷根纳 / 著
黄燎宇 / 译

SVEN
REGENER



雷曼先生

〔德〕斯文·雷根纳／著
黄燎宇／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01年，身兼摇滚歌手、乐手及歌词作者的斯文·雷根纳再度走红德国。不过，这位通俗歌坛明星之所以再度风光，并非因为他所创建和领导的“害群之马”乐队。让德国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一向抱着吉他或是捏着小号抛头露面的“斯文”（出生在不来梅的雷根纳，和许多德国北方人一样，取了个斯堪的纳维亚名字：Sven），竟然斯斯文文地捧着一本三百页的小说走上了讲坛。此番他是向公众朗读他的长篇“处女作”《雷曼先生》（我们在此给“处女作”打上引号，与其说是制造“陌生化”效果，不如说在展示读书收获，因为从不放过字面意思的雷曼先生决不会把一个大男人的第一部小说叫做“Jungfernroman”——中文“处女作”的德文硬译）。面对初登文坛的雷根纳，人们不免心存疑虑：他行吗？谁见过通俗歌星写小说的？比他年长二十岁、胸怀文学抱负的美国大牌歌星鲍勃·迪伦不也是壮志未酬吗？事实上，人们用不着等雷根纳念完《雷曼先生》的第一章，就会自动打消疑虑。因为光凭雷曼先生与拦路狗进行周旋的那段描写，雷根纳就足以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就足以赢得公众的喝彩。业已四十不惑的雷根纳也的确创造了奇迹。他的《雷曼先生》读得德国人心花怒放，喜出望外（也许只有等崔健写出了王朔式小说的那一天，我们中国人才能体会到德国人今

朝的喜悦之情)。小说的主人公雷曼先生很快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艺术形象。

既然如此，雷曼先生魅力何在？

首先，雷曼先生具有反叛精神。他是以胸无大志、以平民心态来反抗社会的。雷曼先生所在的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高度竞争社会。这里人人梦想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都想求个什么“名”，当个什么“家”，社会的阶梯上挤满了雄心勃勃、奋力攀缘的人们。至于年轻人，那就更得作冲刺状、拼搏状。反观雷曼先生，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典型”、“很不标准”的联邦德国青年。雷曼先生十年如一日地在一家小酒吧打工挣钱。虽挣钱不多，但他对生活要求也不高，自给自足不成问题。他甘居下游，甘当小人物，既不想当什么领班、经理，也不跟周遭那些吧台青年似的，向人表白自己其实在搞美术其实在搞音乐其实在上大学。雷曼先生的吧台站得很踏实很快乐，甚至带点自豪。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有斯多葛式的人生哲学，把适性生存、悠闲自在当成最大的幸福，对俗世所定义的“生活内容”则是嗤之以鼻；他还为自己献身吧台生涯找出了非常简单、也非常高尚的理由：既然世上的“酒吧比教堂比美术馆比音乐厅比俱乐部比迪斯科舞厅比天晓得还有什么都多”，既然人们下酒吧跟上博物馆或者听音乐会“一样快乐”，那么一个全心全意站吧台的人就是社会最需要的人。

雷曼先生不仅在内心深处与主流社会、主流思潮保持距离，他的外在生活和外在形象也充分显示出他是如何地不入流。众所周知，德国也是体育大国和旅游大国。这个幅员不辽阔人口不众多的国家在奥运会和足球场

上一直保持着骄人的成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人普遍具有健身意识和健身嗜好，从莱茵河到奥得河，从北海、波罗的海再到阿尔卑斯山，体育锻炼蔚然成风。说到旅游，人们更要对德国刮目相看。由于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的熏陶，也由于长期生活在“冬天的童话”（海涅创造的政治隐喻包含着永恒的地理学真理）里面，德国人普遍渴望远游、渴望阳光，于是他们纷纷走出国门、走向远方。有钱人享受洲际旅行，钱少一点的去周边国家（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马略卡岛不折不扣地成了德国“殖民地”）。八千万德国人，每年出国旅游竟达四千万人次，国外旅游消费约四百亿欧元。蔚为大观的旅游业，在为德国人赢来“旅游世界冠军”称号的同时，给当代德国的文化与时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旅游带来知识与健康，不旅游，就无法开阔眼界，就无法沐浴阳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向为其白色皮肤感到自豪的白种人，到了二十世纪末竟崇拜起古铜色皮肤来，趋之若鹜地把自己晒黄晒黑。惨白的皮肤已是出门少见识少挣钱少的标志。在两德统一后的柏林，白皙的皮肤甚至成为傲慢的西德人在大街上指认“东德老土”的依据。生活在这个体育和旅游大国的雷曼先生，是一个十分扎眼的异类。雷曼先生活动少而且活动范围小。从家乡不来梅来到西柏林的近十年里，他很少离开西柏林，离开克罗伊茨贝格区。即便在克罗伊茨贝格，他也主要在他工作和居住的 36 区活动，他不轻易涉足居民档次高一些的 61 区（克罗伊茨贝格分为 61 区和 36 区）。雷曼先生不仅不外出度假（他自称“不适宜度假”），他的蛰居嗜好竟让他觉得夏天（由于阳光的缘故，德国人特别钟爱夏天）具有“挑战意味”，因为好天气（在德语里面这是艳阳天的同义词）总在无声地命令德国人去享受

烧烤、郊游或者湖边游泳。可是雷曼先生更愿意把所谓的业余时间用来睡懒觉、读闲书。基本上足不出户的他，饿了下小饭馆，闲了逛小酒吧。他不跑步不跳舞不游泳，也不练健美和拳击，所以他没有发达的肌肉，没有古铜色的皮肤，更打不出潇洒的、汉子气十足的直拳或者勾拳，所以他的四肢合不上音乐节拍，所以他的皮肤白得刺眼，所以他在卷入斗殴的时候只能用雷曼式“克罗伊茨贝格钳子”（揪人耳朵）或者雷曼式“反克罗伊茨贝格钳子”（咬人手指）。

不上进、不好动的雷曼先生，在别的地方也常常与主流社会唱反调。比如说早餐。德国人没有创造出灿烂的饮食文化，这是公认的事实。谁都知道德国人做不出声名远扬的名菜大菜，德国人的晚餐桌上只摆着可怜巴巴的两片面包加两片香肠或者奶酪。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式早餐颇有特色。德国人的早餐极其丰盛，从香肠火腿肉馅煎肉，到面包黄油果酱奶酪，再到牛奶酸奶红茶咖啡，还有燕麦鸡蛋生菜水果，真可谓应有尽有；他们用餐时间长，而且很讲情调与排场，喜欢大量使用餐具，还喜欢点上烛光。对于其早餐，德国人一向是暗中得意的。当现代人越来越信奉“早餐吃饱，午餐吃好，晚餐吃少”的膳食准则之后，他们就更加得意了，就更加理直气壮地搞他们的早餐崇拜了。可是，外出早餐的雷曼先生却发现了问题，发表了不太恭敬的言论。再如柏林墙。他听不惯西德游客就柏林墙所发表的那些悲天悯人的反共言论，他认为那都是千篇一律、不过脑子的废话。他尤其要反驳柏林墙让西柏林人置身牢笼的说法，因为修柏林墙的意图并不在于妨碍西柏林人出去，而在于阻止东德人进来。雷曼先生在柏林墙的问题上与众人唱反调，并不是因为他亲共或者亲东德。他是那种

把独立思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最听不得陈词滥调，最见不得人云亦云，再正确的言论，只要重复一百遍，他就会斥之为废话、假话。

如果说雷曼先生因其反主流、反潮流显得潇洒而且可爱，那么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他潇洒不起来，当他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他依旧可爱。雷曼先生是个潇洒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苦恼的尴尬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遭遇尴尬：他清晨归家，路上偏偏撞上一条蛮横不讲理的丧家之犬，在这只迫使他在离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驻步不前的狗面前，他用不上人的智慧，也无法保持人的尊严；他是一个喜好钻牛角尖、喜好争辩的斯文人，但他又被迫卷入打架斗殴，他的衣服脏了破了，嘴上还粘着带有乙肝病毒的血；他无牵无挂、优哉游哉地做了近十年的小人物，可当他的父母大人前来柏林旅游的时候，他似乎突然明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道理，知道“经理”是个“好听的字眼儿”，而且“邻居问起来也好说”，所以他只好屈从来自社会关系的压力，心不甘情不愿地扮演起父母乐于看到的餐厅经理；同样为了父母，他前往避之惟恐不及的选帝侯大街（这条繁华而高贵的商业街当然不会在土耳其人和手头拮据的西德青年扎堆儿的克罗伊茨贝格），前往丝毫引起不起他兴趣的民主德国首都，结果，他不仅要直面自己一向讨厌的街景，而且受到了刁难，遇到了麻烦；他有主见有品位，可是为了追求一个所爱的女人，他去了人声鼎沸、人山人海，而且很难保持尊严的游泳池，穿上了俗不可耐的游泳裤，还去电影院观看他不以为然的《星球大战》。令人惊讶的是，无辜遭遇尴尬的雷曼先生，常常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摆脱尴尬，简直叫人疑心他吉人自有天相。劳西茨广场那条任他绞尽脑汁也奈何不得的恶狗，不仅让他在无意之中用威士忌制

伏了，而且在无意之中替他惩罚了对他很不客气的警察；面对杀气腾腾的神经病和把他视为一泡狗屎的巨型对手，毫无格斗经验的他，居然鬼使神差地动用“克罗伊茨贝格钳子”和“反克罗伊茨贝格钳子”，出奇制胜，重创了敌人；他的餐厅经理闹剧搞得很艰难，最终却出人预料地取得了成功，让父母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冥顽不灵而又缺乏善意的选帝侯大街公共汽车司机，最终被他的灵机一动搞得张口结舌，审讯他的东柏林海关官员则被他的一番诡辩搞得恼羞成怒。

雷曼先生的另外一大魅力，在于他兼有在一般人身上水火不容的品质和能力。雷曼先生没上过大学（他只接受过“运输销售员”的职业培训），也算不得自学成才的博学之士（他的读书时间有限，他的房间里也没放几本书），可是他有思想有口才，常常逮住人们所轻视所忽略的现象和问题刨根问底、大动干戈。母亲的电话将他吵醒后，他把愤怒化为才情，揪着母亲所说的字字句句进行分析、批驳，他仿佛要粉碎母爱的神话，要撕破罩在母子关系上面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以哲学家的思辨激情跟人讨论“醉酒的时候，时间过得快还是慢”的问题，而且他的对话伙伴不是相对论鼻祖爱因斯坦或者是陶醉于时间问题的现代派文学大师，而是他一见钟情的女厨师；进入游泳池，他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混乱、使人丧失尊严的地方，走上选帝侯大街，他体会到芸芸众生的愚蠢和盲目。正因为雷曼先生以杀鸡用牛刀、以鸡蛋里挑骨头的劲头和架势来体味人生，所以他处处发现矛盾与荒谬、滑稽与悲哀，他自己的生活也由此染上了悲喜剧色彩。再者，雷曼先生天生是个受过怀疑主义洗礼的现代人。他见不得感伤的、毫无弦外之音的夸张言辞和表情，“裸情”比“裸体”还叫他难

堪：当卡尔因为他所崇拜的艺术家——雷曼先生的哥哥——在纽约干起了白铁工而呼天抢地的时候，站在一旁的雷曼先生心里直骂“这他妈的澎湃激情”；卡尔的精神病发作后，为了尽快找到卡尔的女朋友，雷曼先生在电话里向中间人叮嘱了一声“人命关天”，话音刚落他便意识到这是“戏剧化语言”，并为此感到不安，所以他只好安慰自己“说别的又不管用”。就是说，雷曼先生很“酷”。难能可贵的是，雷曼先生又没有“酷”到超凡脱俗或者心如死灰的地步。他有热血，也有热泪。为了友谊和爱情，他不惜大打出手，不惜委曲求全。卡尔犯病后，他无怨无悔、全心全意地加以照顾；和漂亮的女厨师卡特琳热恋之时，他也会想入非非，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一些天真的画面，而在目睹卡特琳背叛他那一刻，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正是这等有趣而丰富的性格，让雷曼先生显得那么可敬又可怜，可爱又可笑，他的生活也由此在枯燥中透出辉煌，在平凡中显出非凡。

综上所述，雷曼先生是孤本，是一绝，是与众不同的人物。但同时必须指出，雷曼先生也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代表着一群人或者说一类人。要说明这个道理，还得从小说的结尾谈起。我们知道，雷曼先生是在把卡尔送进乌尔班医院，在他的三十岁生日悄然而至，以及柏林墙轰然倒塌（比喻而已！）之后告别读者的。既然小说如此收尾，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雷曼先生和卡尔，雷曼先生和柏林墙有什么关系。前者可谓一目了然：虽说卡尔沉湎于吸毒和艺术家幻想，雷曼先生却一不沾毒二不沾艺术，但是他们不仅亲如兄弟（由于叙述者提到卡尔的时候十有八九要声明这是雷曼先生“最好的朋友”，所以“他最好的朋友卡尔”也成为

这部作品的一个“主导动机”），而且在卡尔精神崩溃之后，兔死狐悲的雷曼先生还认识到他们其实是难兄难弟，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至于雷曼先生与柏林墙，这是一个需要加几句话外音才能说清楚的话题。从表面看，雷曼先生一向认为柏林墙与自己毫无干系，即便听到柏林墙倒塌这一轰动性新闻的时候他也照样无动于衷：他是在“而立之夜”光顾第四个酒吧时偶然听人说“墙开了”的，除了一声“我操”，他并没有任何欢呼雀跃或者激动不已的表示。酒吧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坐在雷曼先生旁边的海可甚至说“墙开了，这又怎么着哇，墙开了。屁眼儿开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雷曼先生和海可勉强赶到奥贝鲍姆桥看热闹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万众欢腾的宏大场面。桥对面过来的东德人，不仅——正如一个看热闹的克罗伊茨贝格人所说——“稀稀拉拉的，就像小孩撒的尿”，而且他们刚一踏上西德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嘟哝“这儿看起来和我们那边一样啊”。较为热闹的莫里茨广场也很让他们失望，因为除了那“噪音震耳欲聋，尾气令人窒息”的汽车长龙，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最后，雷曼先生只好继续上酒吧借酒浇愁（卡尔的崩溃使他很受刺激），同性恋海可则直奔勋内贝格，希望在沸腾的“同性恋亚文化圈”里与昔日的同性恋朋友重逢（他是因为不堪忍受同性恋在东德的“三孙子”处境而逃到西柏林的）。换言之，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既没有给雷曼先生们（我们可以使用复数了）带来莫大的喜悦，更没有让他们在喜悦中忘却个人的烦恼。他们在奥贝鲍姆桥、莫里茨广场以及去莫里茨广场的路上所见到的乏味场面和滑稽插曲，将构成他们对那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的基本回忆。透过两德统一，他们只看到东德人的盲目自卑（如嘟哝“这儿看起来和我们那边

一样”的东德女人），西德人的盲目自大（如被海可戏弄的西柏林出租司机），以及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的思想隔阂。

企望在小说里读到宏大叙事的人多半要对《雷曼先生》的结尾摇头叹息。他们也许会抱怨雷根纳以偏概全，抱怨他把握不住历史的命脉。但是，身为小说家的雷根纳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天才的斯太尔夫人早在两百年前就说过，长篇小说旨在拾遗被历史文献所遗漏的东西，如日常生活，如个人世界和内心世界。这句曾经让歌德如获至宝（斯太尔夫人的相关论文最早由他亲自翻译成德文）的至理名言，肯定也会让雷根纳拍案叫绝（半路出家的雷根纳可能没有读过斯太尔夫人的小说理论）。雷根纳说过，“管他狗屁历史，讲你的故事吧”；他还说过，没有谁能够写出“人们”对两德统一的体会和反应，小说家只能描述单个的人如何经历那段历史。而他的《雷曼先生》，就是要讲述他和他的克罗伊茨贝格同类的故事，讲述他们直到柏林墙倒塌以前的悲欢离合。雷曼先生的故事始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终于十一月九日，为时两个月。就是说，当卡尔沉湎于吸毒和所谓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当雷曼先生穷于应付各种日常烦恼的时候，一墙之隔的东柏林正发生着风起云涌的游行示威。尽管媒体对于东德的革命风暴进行了充分的报道，雷曼先生们却看不出柏林墙里面（当然也可以说外面，依视角而定）发生的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或是睁只眼闭只眼（迷迷瞪瞪的雷曼先生在卡特琳的床上看见“电视里正在播放什么游行的画面”），或是左耳进右耳出（听说“那边闹得很厉害”的时候，雷曼先生只来了句“这和西柏林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基本心态则是：你搞你的革命，我有我的烦恼，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即便在目睹革

命风暴吹垮柏林墙之后，雷曼先生们依然无动于衷，依然作事不关己状：立也罢倒也罢，关我屁事（克罗伊茨贝格流行粗话）！但是，对“隔壁”、也就是对世界历史漠不关心的雷曼先生们，万万没有想到世界史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忘记了一点：西柏林与东柏林，其实是唇齿相依的。没有东柏林，哪来的西柏林？这不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游戏，这是一个很尖锐的现实问题。如果说苏、东剧变和随之而来的两德合并只给西德人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如果说西德的普通百姓因为背上东德的经济包袱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也有东德人开始怀念柏林墙，德国人大都承认自己的脑子里还立着一堵柏林墙），那么身处克罗伊茨贝格的雷曼先生们就更有必要凭吊那业已倒塌的柏林墙。克罗伊茨贝格之所以成为西德的“波希米亚人”（该词的内涵及其译法还有待于探讨）的理想栖息地，是因为他们在这里享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如便宜得不可思议的房租（据雷根纳本人讲，雷曼先生那种一居半月租金仅九十马克，这在别的地方至少得翻倍），如轻松愉快的生活氛围（五彩缤纷的青年娱乐场所外加异域文化风情）等等。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和克罗伊茨贝格的“墙根儿”位置有关。随着围墙的倒塌，克罗伊茨贝格对“波希米亚人”的吸引力远不如前，所以他们——其中也有雷根纳——纷纷迁往东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自以为“柏林墙关我屁事”的雷曼先生们，终于发现倒塌的柏林墙还是会砸到自己的身上。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雷曼先生》是一部讲述三十而立的小说，小说的作者却已四十不惑。如果四十岁的雷根纳让三十岁的主人公跟自己一样地不惑，《雷曼先生》恐怕就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而立小

说。值得庆幸的是，写作新手雷根纳没有犯下这个一不留神就会出现的错误。他非常聪明、非常高明地放弃了传统的全知叙述，代之以现代小说中常见的人物视角或者叫内视角，对于雷曼先生（叙述学家将称之为“聚焦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叙而不议、观而不语——哪怕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和分析雷曼先生的“而立困惑”及其艰难的“去惑”过程。不过对读者来说，这一任务也并非易如反掌。因为当人们阅读一本用主人公的眼光来叙事的小说的时候，小说主人公的思维局限和感知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读者的思维和感知，使之难以做到旁观者清。具体就《雷曼先生》而言，若不读到小说的最后几章，一般人恐怕很难超越主人公的认识水平。主人公弗朗克·雷曼一出场就是满脸的困惑，因为他的狐朋狗友们得知他即将三十而立之后，便置德语语法和社交规则于不顾，改口叫他雷曼先生。自从被冠名为听着别扭的“雷曼先生”后，弗朗克·雷曼就麻烦不断（麻烦的名字可以是劳西茨广场、选帝侯大街或者民主德国首都，但也可以是卡尔、卡特琳以及抢走卡特琳的水晶赖纳），潇洒无忧的日子一去不返。“雷曼先生”由此成为他生活中的主导动机和烦恼的同义词。雷曼先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把三十而立视为万恶之源。直到卡尔和柏林墙都倒下后，雷曼先生才意识到那接二连三的麻烦背后分明潜伏着某种必然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是：生活中“有什么东西行不通了”。可究竟是什么东西行不通了呢？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雷曼先生却是语焉不详，但这不足为奇（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雷根纳不会为雷曼先生，也不会为读者捅破遮蔽真理那层薄纸），也不足为憾。如果我们听听乌尔班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给卡尔，其实是给克罗伊茨贝格青年所下的集体诊断

(克罗伊茨贝格的生活很轻松，久而久之多数人还是需要为这种生活找一个合理的根基），如果我们再看看雷曼先生脑袋里冒出那些很不雷曼式的想法（他不仅大谈“脱胎换骨”，他还考虑是否需要买电视，是否需要去度假或者改换职业），我们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是克罗伊茨贝格行不通了。克罗伊茨贝格好虽好，但谁也没有永远的克罗伊茨贝格。而立之人必须告别克罗伊茨贝格！

和所有成功的文学艺术形象一样，雷曼先生诞生伊始便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先是昔日的克罗伊茨贝格“波希米亚族”发出“雷曼先生就是我们”的惊呼，继而是普通的德国人在阅读的时候蓦然回首：雷曼先生不代表我们代表谁？与此同时，学识渊博而又联想丰富的评论家们纷纷给雷曼先生攀亲戚、订家谱，有说他像痴儿西木的，有说他像奥勃洛莫夫的，也有人说他像匹克威克，像格里高尔·萨姆沙，还有——真是匪夷所思——唐老鸭的幸运表弟。我们相信，随着《雷曼先生》被移译为各国文字，雷曼先生还会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激发更为丰富的联想。但愿《雷曼先生》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让未来的读者高喊“雷曼先生属于全世界”。

2002年11月25日

1.

2001年8月，德国的艾希博恩出版社推出了摇滚明星斯文·雷根纳的长篇小说《雷曼先生》。这是雷根纳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文坛首秀。我们的歌星写小说了！他行吗？《文学四重奏》怎么说？

德国公众所惦记的《文学四重奏》，是德国电视二台的四人谈电视书评节目。每一期节目都是三个固定嘉宾加一个不断轮换的神秘嘉宾。三位固定嘉宾都是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赫尔穆特·卡拉赛克、西格丽德·勒夫勒是经典的三人组合。

这是一个红花配绿叶的节目。红花是赖希－拉尼茨基，绿叶是其他几个人。这种组合也反映在发言时间的分配。据统计，赖希－拉尼茨基的发言占用了50%的节目时间，其他人依次为30%、20%、10%。

从1988年至2001年，《文学四重奏》足足红火了十三年。该栏目总是在星期日下午播出，收视率极高，观众人数常常在七、八十万，有时达一百五十万（我们中央台的读书栏目《读书》最高同时观看人数为二百万），而德国的人口约八千万。

这是赖希－拉尼茨基的功劳。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是一言九鼎、家喻户晓的文学批评家，人称“文学教皇”。他是明星级批评家。据说，如果走在大街上，连好些出租车司机都认得他。在作家圈，他是一个人见人爱、人见人怕的绝对权威。这正如美因茨科学院的一份授奖证书中所说，德国作家全都梦见过赖希－拉尼茨基。有时是美梦，有时是噩梦。作家们都知道：他夸你，你会一夜走红；他骂你，你也会走红，因为公众想知道他为什么骂你；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他漠视你，就是他不理你，他主持的《文学四重奏》当你不存在……难怪有作家要借用笛卡尔的句子表达心声：“他评论我，我才存在。”

雷根纳是有福之人。因为他的小说刚刚问世就入了《文学四重奏》的法眼。2001年8月17日下午，在第七十四期《文学四重奏》上面，“文学教皇”告诉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雷曼先生》是一本“值得高度重视的小说”，这本小说看得他哈哈大笑。一旁的卡拉赛克则连声赞叹《雷曼先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与此同时，《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每日镜报》、《明镜周刊》等重要报刊也一片叫好。《雷曼先生》当然是一本好书。

在“文学教皇”和众人的祝福声中，业已四十不惑的摇滚明星雷根纳成为联邦德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他的《雷曼先生》荣登《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它的销量越来越大，其印数在2004年就冲破百万大关；它的译本也越来越多，已译成十六种语言。可以说，《雷曼先生》征服了德国，走向了世界。

2.

《雷曼先生》还有更多的辉煌和热闹。因为它的粉丝们要的很多。

一方面，雷粉们想听更多的故事，想了解雷曼先生的前世今生，所以雷根纳一鼓作气写出了雷曼先生的前传和续集。前者题为《堡尔南新区》(2004)，讲述雷曼先生1980年代初在不来梅老家和在国防军服役的经历，后者题为《小兄弟》(2008)，集中描写雷曼先生从不来梅到达西柏林之后头两天的生活。它们和《雷曼先生》一道构成“雷曼三部曲”。2014年，雷根纳还发表了《奇幻之旅：卡尔·施密特的回归》。在这部小说中，雷曼先生“最好的朋友”卡尔成为主人公，他则成为配角。

另一方面，雷粉们并不满足于《雷曼先生》带来的文字享受，所以《雷曼先生》有了跨媒体的改编。

2003年，德国著名导演林德·豪尔曼把《雷曼先生》改编成同名电影，雷根纳亲自撰写脚本。该片荣获德国电影最高奖劳拉金质奖和劳拉脚本奖。该片现有的中文译名则令人唏嘘再三：《西柏林恋曲》。

2008年4月，德国有声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广播剧《雷曼先生》和有声书《雷曼先生》，后者由雷根纳本人朗诵。同年9月，由女导演尼娜·居尔斯多夫和编剧阿克塞尔·普罗伊斯制作的话剧《雷曼先生》在海德堡剧院举行首演。

2014年，连环画小说《雷曼先生》问世。由新时代漫画家蒂姆·丁特尔作画。

今天的《雷曼先生》，已经可读、可观、可闻，几乎被打造成为一件总体艺术作品。